泉州十二时辰：重返“刺桐”

□ 颜瑛瑛

宋元中国的海洋商贸中心——泉州，是旅行家马可·波罗笔下的“东方第一大港”。“刺桐”，是彼时泉州的别称，此地安逸、富庶，有艺术，有技术，时尚且浪漫。

晋代南渡之士，为这片曾经的蛮荒之地带来了中原文明，南宋朝廷设置的南外宗正司，将中国最繁盛时期的皇室礼俗全盘收纳在此，渐入民风。物转星移，世事变迁，中原文化的精致与郑重，海洋文化的开阔与包容，早已随着南来的季风，渗透在古城的每一寸肌理中。沉淀千年的泉州文化，成为一窥宋元中国文明与气度的珍贵蓝本。

5:30 通淮关帝庙

每天清晨，坐落于泉州鲤城区涂门街的通淮关岳庙准时开门迎客。很快，络绎不绝的人气和袅袅不息的香火，便会演绎出这条街上最热闹、最繁忙的景象。

这里是泉州最大的民间信仰活动场所之一，其所在地通淮门是古代泉州的水陆要冲，海外到泉州贸易，通淮是必经之路。一年四季，无论风雨，泉州百姓都要前往关岳庙焚香祈福。

古城面积不大，而分布于纵横巷陌之中的大小宫庙就有五六百座，门庭从不冷落，氤氲的香火中夹杂着人情热度。自古以来，不论是来自他省还是番邦异国，泉州人对神明如同对待朋友，秉持着“多多益善”“来者不拒”的原则。

泉州的民间信仰没有一板一眼的修身体训，更多讲求的是谆谆劝善和直白道理。诚如关岳庙门前对联所言：“诡诈奸刁，到庙倾诚何益；公平正直，入门不拜无妨”。

7:00 承天寺鹦山馆

最近，泉州历史文化中心旗下的五祖拳鹦山馆开馆收徒，身为国家级非遗五祖拳传承人的周焜民，几乎每天上午都要亲临现场督学指导。同时有六七位师父手把手地教学，真正做到了“言传身教”。

崇文尚武，是泉州自古以来的风气。“烧酒、拳头、曲”这句俗语，生动概括了泉州人日常生活里的三大娱乐项目。过去，泉州很多孩子从小就会被送去学武，周焜民小时候就是因为身体羸弱而被父亲拉去习武的。

周焜民的女儿回忆，小时候，父亲还年轻力盛，每天都早起练拳。从前的居所没有庭院，他天天对着墙壁打直冲拳，日久，墙上的石灰先是发黑，隆起，然后掉下，成了家中一景。慕名来和父亲学武的年轻人也很多，到了周末夜晚，父亲便去文庙前的石埕教授。那时的文庙行人少至，是安静练武的好地方，没有灯光，月光下，仅有模糊可辨的人影伴着嘿嘿发力声和隐隐的拳风。五祖拳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中，口授身教，一代一代在民间传承下来。

8:30 市井小吃店

每天早晨，不少人骑上共享单车，或是搭乘古城“小白”(古城专线游览车)，到老城区觅食。在路边停下来吃一碗面线糊配油条，或是吃一个烧肉粽，两个碗糕，喝上一碗水丸汤，咀嚼着千百年前的古早味，不慌不忙地开启一天的工作。

泉州美食作为闽菜的主角之一，不乏大菜和名菜，但名扬四海的却是面线糊、肉粽、牛肉羹这些市井小吃。或许对拼搏惯了的泉州人来说，这些淳朴的味道才能真正唤起他们对生命和生活的珍视和热爱。

泉州小吃极其丰富，西街面线糊、安海土笋冻、东石海蛎煎、深沪拳头母、湖头米粉……当地人如数家珍。虽然晋人南迁已成如烟往事，但其“古早味”却深烙在泉州人的味蕾上。生活在四季温暖如春的温陵故地的老泉州人，至今仍熟练掌握着很多古老的中原烹饪技法，固守着“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士族饮食情趣。

15:30 古厝茶馆

在泉州，饮茶是极为普遍的生活习惯。许多泉州人晨起第一桩事就是煮水泡茶，这“早茶”不入口，仿佛一整天都提不起劲。古语“寒夜客来茶当酒”，泉州人习惯了客一进门即泡茶，而且要立刻煮水，重换茶叶。

除了居家备茶，许多泉州人也是茶不离身。闲暇时随身携带几泡茶，出了门来到落脚的地方，一张八仙桌，几条长板凳，一字摆开的茶盏，几十个茶杯列成方阵，一场茶韵雅集就可以开始了。

老泉州都会记得过去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茶肆，俗称“茶桌仔”。“茶桌仔”往往又是“讲古”场。一壶茶，慢斟浅酌，听“讲古仙”讲《三国》讲《水浒》。如今街头“讲古”虽不见，但城中茶馆还可得偿所愿。

泉州人爱茶，不仅爱饮，还爱斗。这源于铁观音得天独厚的神韵，也源于闽南人巧夺天工的制茶技艺。在泉州，茶店星罗棋布，常常可见一条几十米的小街，茶叶店就有三五家。于是，“斗茶”成为泉州人找好茶最好的途径。每逢新茶上市，形式多样、规模不一的“斗茶”就遍地开花。

18:30 泉州府文庙南音戏台

在泉州，你或许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文化宫或文庙某一角，被一群表演者的声音所吸引，好奇地走入露天观众席里，找一个座位坐下，吮一杯浓茶，开始聆听泉州街头巷口都有可能飘出的南音。

我们应该庆幸在泉州可以看到这样的形式，把“御前清曲”平民化，方便了聆听的可能性与民众的参与度。尽管舞台不够完美，音响中夹杂着轰鸣，还有那些浓妆艳抹的舞者和台下来回走动的观众，都让南音与殿堂级艺术的猜想相去甚远。然而，这正是南音在泉州这片土地上源远流长的证据。

民间故事的性质，将欣赏南音的入门台阶放到了最低，南音讲述的故事，所有人都能“听懂”。南音唱腔中的一个起承转合，琵琶中的“一点”“一挑”，不仅是唱者与乐手之间的默契和对话，更是听者与曲中的人物交心交情的沸点。

南音之所以能世代相传、久唱不衰、新人新曲不断涌现，与泉州人对南音的执着追求与默默奉献是分不开的。自古，海内外就有从泉州引进资深艺人去设馆授徒的现象。因此，海外用泉南腔予以吐音叫字的演唱规制一直没有改变，其演唱、演奏风格，亦保留着故乡泉州的传统特色。南音那深情、悠久的旋律，与具有清商乐的“古士君子之遗风”，最能勾起海外赤子的思乡之情。

19:15 泉州梨园剧院

“光明之城东门附近的一大片地方，舞台在灯笼和灯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一到晚上，这里有很多演员和歌手，至少有100个剧团，每个剧团都站在自己的舞台上，剧团周围都有一大群人，在等待着演员的台词和乐队的演奏。”1271年，一位叫雅各的意大利犹太商人冒险远航东方，来到刺桐，在其著作《光明之城》中描述了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泉州。

且不论雅各讲述的记忆真实与否，南音、梨园、高甲戏等传统艺术，至今仍在泉州广受欢迎。

南宋末年，宋室小朝廷南迁，皇家子弟因思念故土，将中原文化的精髓带入泉州，横挑龙头凤尾扁担的“七子班”梨园戏，亦跨出官家富室的门槛来到民间，进入勾栏瓦肆之间。被称为“宋元南戏遗响”的梨园戏，就这样在泉州民间生根蔓延。

夜晚，泉州梨园剧院前广场，总是有人三五成群地在“候场”，其中不乏年轻人和带着孩子的父母。这些福建省梨园实验剧团的“忠粉”，生怕落下一场演出，哪怕是他们已反反复复看到都会背的剧目。

文化源自人类的生活，而生活又反映着文化。一座以历史文化著称的城市，拥有星罗棋布的文物遗址和依然鲜活的传统民风。出于肆、入于邑，清明插柳、端午裹粽、冬至搓丸、新年买橘，在岁月的起落中繁衍生息，久远的历史在这里触手尚温。

①泉州安溪一处茶馆，主人以“宋代点茶”待客。 颜瑛瑛/摄
②泉州。 视觉中国供图
③泉州伯乐剧场，梨园戏浸入式表演，在充满现代感的文化街区，零距离面对观众演出。 潘 登/摄

编者按

7月25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成为我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称“刺桐”，至今拥有星罗棋布的文物遗址和依然鲜活的传统民风。让我们来到“东方第一大港”的黄金时代，重返“刺桐”。

泉州

“世界第一大港”泉州的黄金时代

□ 马 龙（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
□ 徐 阳（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泉州的国际传播历程贯穿社会发展始终，夹杂着复杂的本土因素和海外因素。走进历史是为了阔步走出历史、更好拥抱未来。无论是世界的泉州，还是中国的泉州，我们试图把关键历史节点加以勾连，还原泉州2000年的沧海横流。

萌发：公元前3世纪-公元10世纪

泉州倚山为险，滨海称雄，往北奠定了中国最富庶地区——江浙地区的藩篱门户，往西勾连了中国“南天门”——两广地区的唇齿，往东则面朝大海联通世界，区位优势显著。

泉州地区的原住民是百越人，中原汉族文化在泉州的源流则始于秦征岭南融百越时期。留在闽粤地区的军士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刀耕火种逐步向沿海地区的自然渔业和平原地区的小型稻作农业发展。人们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交流空间日渐扩大。

历史上数次中原动乱，对江南或者更广阔的南方地区的开发起到了关键作用。永嘉之乱与安史之乱，大量“衣冠南渡”的移民在泉州繁衍生息，到了唐朝末年已成为该地区的主导人口。

移民的迁入引发了泉州的内部拓殖，随之而来的是泉州地区区域都市化的进程。南下的移民大范围开发农业，创造了大量剩余农产品，催生了市场交易、物质传播、人际沟通。移民聚居形成集镇，初级集镇因贸易文化的发展开始向高级别城镇过渡。吴永安三年（260年），置东安县，至此泉州正式出现经济核心区位。

城镇的兴起，促使泉州的城乡形成互通有无、分工明晰的传播网。而南下移民所秉持的避乱心态、开放特质、融合形态，奠定了泉州地区多元杂糅、密切接触、主动融合的人口结构与文化特性。

唐代是中外交流转变的关键时期。汉唐以来，中外的通商、朝贡等都是依靠中国西部的“陆上丝绸之路”。安史之乱后，盛极一时的唐王朝日渐衰落，西域的通道被废弃，唐朝转而开辟闽粤海上通道。而这一时期，也是泉州由帝国边陲城镇转变为世界四大口岸之一的关键时期。

唐朝大和八年（834），泉州正式设置管理海外来华贸易的使节、商人和闽人出海贸易的机构。同时，大量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的僧侣、信众往返于泉州等地，进行宗教交流与文化传播。

唐末五代时期，中央集权的帝国统治被“悬置”分治。割据政权为了在不寻常状态下开拓生存空间，必须采取灵活的社会经济措施。泉州的民间商业已然活跃，加之分治政权的宽松对外政策，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地方政权的特殊政策、民间工商传播力量、宗教传播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泉州的对外交流呈现出“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的繁荣景象。

繁盛：10世纪-14世纪初

五代时期，王审知建立闽国，在当时泉州的政策中，清晰注有招募海内外商贾来华和出洋贸易，制定法权，鼓励通婚，发展外商在华教育，遣使出访东南亚各国等条目。这些政策的施行，极大促进了泉州的对外交流，呈现为转口贸易为主、人文交流为辅的特征。转口贸易，使泉州地区乃至整个闽地的农业和手工业得到大幅度发展，促使包括舟船、桥梁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空前改善。

泉州与海内外贸易往来之浩繁、人文交流频率之高，终于获得官方的认可和支持。宋朝元祐二年（1087），朝廷正式下令在泉州设置市舶司。以此为标志，泉州即将迎来海外商业文化传播交流的大繁荣时期。其后偏安江南的南宋，和横跨欧亚大陆的元朝，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考虑，相继支持泉州的海外贸易和人文交流事业。

泉州的海外活动范围，广达印度、阿拉伯世界、波斯、欧洲和东非沿海。到了元代，泉州已经与这些地区形成较为官方化和稳定的经济贸易与文化往来。宋元之间，泉州与海外构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传播网络，这一网络由几条海上航线为主干，维系着泉州与世界的联系。从泉州外销的产品，包括丝绸、瓷器、茶叶、手工制品；泉州海商亦从海外带来了大量的金银、香料等商品。

随着海外贸易和人文交流的发展，大量外国商人、宗教团体、避难群体，来到泉州侨居，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文化杂糅的现象。元朝带来的“蒙古和平”，促进了欧亚大陆各地的贸易联系，中国海船成为这个时期世界传播体系的主要推动力。

这一阶段的泉州，被誉为中世纪世界第一大商埠、东方第一港。贸易流通的繁荣、多元文化的汇流，泉州从中国地方进入世界中央。

萎缩：14世纪初-20世纪中叶

从明朝建立到20世纪中叶，泉州的国际传播式微。

明朝建立之初，朝廷对在泉州经营了几代人的波斯儒商家族——蒲氏家族，进行沉重打击。蒲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际舞台全方位的失落，不仅是一个家族的命运问题，更是对外交流群体在明朝的命运问题。

其后，在明朝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增强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传播。据考，郑和下西洋之前，多次前往泉州收集东西洋航海资料、招募船工、采买物产、前往各宗教庙宇行香。这些行为，不仅是为远航奠定物质基础，更是对海神文化、异域文化的致敬。

然而，郑和下西洋，主要履行的是“怀柔远人”的使命，而非经贸往来，这与宋元时期国际传播的结构特征有着明显区别。从每次出航“厚往薄来”，以及后期财政无力负担远航的事实，均可管窥一二。

14世纪后期至16世纪初期，泉州伴随着经济圈的衰落、海外交通的倒退和政治控制的加强，国际传播日渐萎缩和衰落。明清施行“海禁”政策，随之而来的是城市开放活力与国际传播能力的下降。

但在此期间，泉州地区产生了一种新的国际传播方式，即大量海外谋生移民群体开始出现——“下南洋”是这一时期的移民史的代表，更是一种文化的传递与交融。

南洋民谣、歌仔戏、华人诗歌、南洋文学、南洋钱法、中草药文化、新加坡水墨画、娘惹菜、峇峇娘惹建筑……等等形式无不彰显着中华文化南移的趋势。这批传播使者成为异域经济开发的主力军，而他们积累的大量资本又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清末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短暂春天和国际传播的短暂复兴，即为有力的佐证。

“驿马匆匆过四方，任君随处立纲常，年深异境犹吾境，日久他乡作故乡”，这样的字句显示了这些特殊的国际传播群体者坚定、饱满的精神力量。但好景不长，其后的军阀混战和日本侵华战争，导致传播再度出现区隔与阻碍。

泉州历史经验的当代启示

泉州人劈浪斩荆开辟世界通道，耕海牧洋赢纳不同文化，展示了中华海洋文明为东西方国际传播作出的不可估量的贡献。

在不同朝代，虽然政治、经济形态与民族关系都不尽相同，但泉州伴随着海丝文化的持续传播与兴盛，为国际传播网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这张网中可以看到，在西方地域之外，存在过一个跨区域、跨文明、跨民族的世界体系，该体系的广度并不逊色于后来由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

泉州国际传播的历史经验带来的当代启示有：一、注重内外有别、内内有别，掌握传播主导力。依靠强大的经济、文化、科技实力作支撑，不断调整传播的话语体系，善用“外人”阐释中国，宋元时期的历史经验显示，“重用番人”参与商贸、出使海外，发挥了显著作用。一方面通过加官进爵对他们予以严格规制，另一方面允许“番人”成立组织，享有一定法权。中央政府一方面对对外活动加以鼓励，另一方面从形式、规模、监督层面进行管控。

二、力求多元主体、平等交往，加强文化包容力。“下南洋”的历史经验表明，普通民众能使单向宣传变为互动沟通，大大减少文化折扣，营造良好的文化交流氛围。

三、重视公共外交、双向对话，拓展国际影响力。宋元官方向海外推行“市舶祈风仪式”和“天后仪式”，郑和七下西洋，这些行为都全方位地传递了中华文化，深刻影响海外公众，提升了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

□ 杨印民（历史学博士、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13~14世纪，经过蒙元帝国的西征和南伐，亚欧大陆首次被连结成一个整体，海上、陆路“丝绸之路”全面拓通，中国第一次实现了西北内陆和东南海洋两大出口的全球开放格局。正如元代旅行家汪大渊在《岛夷志后序》中写到的那样：“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

泉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在元代海外贸易中当之无愧地占据首要地位，泉州也由此进入到自身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

蒲寿庚与泉州市舶司

元代泉州港的兴盛离不开一位重要人物，那就是从南宋降元的原泉州市舶司提举蒲寿庚。蒲寿庚于宋末垄断泉州香料海外贸易近30年，王磐《藁城令董文炳遗爱碑》云：“泉州太守蒲寿庚者，本西域人，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南海蛮夷诸国莫不畏服。”

蒲寿庚亦官亦商，凭藉手中显赫的权力与雄厚的海上资本实力，成为宋元鼎革之际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至元十四年（1277），元朝在泉州恢复市舶司之设，泉州成为元朝设立的第一个市舶司，这也是元朝海外贸易的发端。同年四月，中书左丞董文炳谒见元世祖忽必烈时说：“寿庚素主市舶，谓宜重其事权，使为我捍海寇，诱诸蛮臣服。”蒲寿庚于是被朝廷任命为闽广都提举福建广东市舶事。

蒲寿庚弃宋降元和重主市舶司，使元朝政府不仅拥有了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泉州和大量海舶，还获得了熟悉海外交通、国情和贸易的大批人才。蒲寿庚以其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及其在海外诸国穆斯林海商中的威望，积极恢复和发展泉州的海外贸易，为泉州港在元代成为世界最大的商港之一奠定重要基础。

至元十五年（1278），忽必烈通过蒲寿庚等人向海外各国宣布了元朝欢迎并保护通商贸易的谕旨：“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

之前的海外贸易一般以朝贡为目的，后来的明朝也是如此，政治意义更大一些。忽必烈在这个谕旨上，欢迎“往来互市，各从所欲”，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倾向非常明显。这条谕旨也得到了诸多海外国家的回应，次年即有占城（越南）、马八儿（印度半岛东部）等十多个国家的使臣和舶商来到泉州。

香瓷之路

元代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被称为舶商，舶商中有不少自己拥有船只和雄厚资金的大商人。如蒲寿庚的女婿佛莲，“其家甚富”，有海舶80艘。

元代海舶制造和航海技术都居于世界先进之列，再加上全国统一以后，农业、手工业都得到恢复和发展，能够为海外贸易提供丰富的物资。因此，中国商舶东起高丽、日本，中经东南亚诸国、印度次大陆，西抵阿拉伯半岛、波斯湾沿岸、非洲沿海地区，贸易活动的范围远远超过前代。

元朝通过泉州等港口由海道出口的商品，主要有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两大类。农产品主要是谷物稻米，但因政府屡加禁止，所以出口有限。在对外贸易中占据大宗的是手工业品，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是纺织品，包括生丝以及苏、杭五色缎、紬、绢、布（花布、青布）等。纺织品是传统出口物资，享有极高声誉，深受亚、非各国欢迎。

二是陶瓷，包括陶器和瓷器。著名的元青花瓷就是外销瓷，今天在伊朗、土耳其等国家的博物馆中都保存有元代青花瓷器，非洲不少地区也有元代瓷器遗物出土。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说，中国瓷器品质最佳，远销印度和其他国家，直到他的家乡摩洛哥。

三是金属和金属器皿，有铁条、铁块等半成品和锡器、铜器、铁器等。元朝政府禁止金、银出口，但仍有不少金银被走私外流。

此外还有日常生活用品，如木梳、漆器、雨伞等；文化用品，包括各种书籍、文具和乐器，前两者主要出口高丽和日本；经过加工的副食品，如酒、盐、糖等。

这些商品除了一部分是供各国上层社会消费之外，很大一部分都是民众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物资。

元代泉州从亚、非各地进口的商品，种类多达二三百种，既有来自东、西洋的货物，也包括自日本、高丽进口的商品。这些进口商品中，象牙、犀角、真珠、珊瑚等“宝物”和沉香、速香、檀香等“香货”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些贵重物品主要是为了满足皇室、贵族等上层社会奢侈生活的需要。

药材也是重要的进口物资。除了从东、西洋进口的没药、阿魏、血竭等药物外，还从高丽大量输入茯苓、红花等物。另外，部分香料也当作药材使用。

进口的其他物资还包括白番布、花番布、剪绒单、毛驼布等各种布匹，青铜器、藤席、椰簟等生活用具，以及皮货、木材、漆等物。日本出产的木材深受欢迎，是建筑和造船的极好材料。高丽出产的新罗漆，质量很高，最适于饰蜡器。

值得注意的是，自宋元以来，大宗出口商品中，丝绸因偶有禁断，比重有所下降，而瓷器出口的比重显著增加。进口商品中，珠宝的比重在逐渐降低，香料的比重却因需求的旺盛大大增长。这样，出口瓷器，进口香料，宋元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又称“香瓷之路”。

梯航万国

有元一代，经由朝廷指定先后开放的对外贸易港口，最多时有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广州、上海、澉浦（今属浙江海盐）、温州、杭州等七处。但兴废不常，到元末，仅有泉州、广州、庆元三处。

有学者推算，元中叶，每年从海外输入的珠宝有四百斤，黄金多达三千四百两。仅黄金一项的收入，就相当于朝廷岁入黄金总数的六分之一。无怪乎元人将海外贸易看作是“军国之所资”“国家大得济的勾当”。

元后期，与泉州进行海上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达百余个，除了亚洲，还有非洲东海岸的许多国家，甚至到达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元人庄弥邵《罗城外壕记》载：“泉本海隅偏藩，世祖皇帝混一区宇，梯航万国，此其都会，始为东南巨镇，或建省，或立宣慰司，所以重其镇也。”

作为世界性的大港，泉州港每天吞吐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品，“熏陆胡椒腽肭脐，明珠象齿骇鸡犀。世间莫作珍奇看，斛使英雄价尽低”。由于奇珍异品太多，即使像珠宝、香料、象牙、犀角这样贵重的宝货，在泉州也成了物美价廉、寻常可见的东西。

威尼斯商人出身的马可·波罗也观察到了这一点。他离开中国之时曾取道泉州，在那里待过一段时间，对泉州港的观察也很仔细。据他估计，当时泉州的吞吐量，相当于亚历山大等其他地中海沿岸港口的一百倍。

和平友好的海外贸易关系，也加深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友谊。当时东、西洋各国都称中国人为唐人，中国商船为唐舶。文老古（摩鹿加群岛）人民“每岁望唐舶贩其地”；浡泥（加里曼丹岛）人“尤敬爱唐人，醉也则扶之以归歇处”；以商贩为生业的交趾各个港口，“饮食衣服皆仰北客（指中国商人），服饰日用都是元人风俗……

元代理学宗师吴澄这样描绘元代泉州海外贸易的盛况：“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